

# 青年毛泽东与“湖南门罗主义”<sup>\*</sup>

戴开尧<sup>1</sup>, 祝俊峰<sup>2</sup>

(1. 湖南科技大学 法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2. 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在湖南自治运动中,青年毛泽东仿照美国“门罗主义”提出“湖南省湖南人之湖南”的“湖南门罗主义”口号,它的基本主张是“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以及“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这一思想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中外地方自治思潮、严峻的国情、省情、民情及湖湘文化浸染下的湖南人刚劲强悍性格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综合体,这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军阀割据,但同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总之,“湖南门罗主义”是一种近代中国的人民民主主义思潮。

**关键词:**湖南自治运动;湖南门罗主义;青年毛泽东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7835(2004)03- 0025- 04

一 “湖南门罗主义”的提出与基本主张  
清王朝的迅速垮台、袁世凯、张勋帝制复辟的失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深入人心。各地军阀为缓和人民大众反对专制、争取民主而纷纷打出“自治”旗号,唱着“民治”高调,以遮人耳目。1920年,以湘籍文人而官僚而军阀的谭延 面向全国发表“电”,首倡“省自治”并颁布了《湖南省宪法》。这是首次在中国产生的一份地方分权自治的宪法,省的权力在省宪中一一列举,以期日后全国实行地方自治时划分中央与地方权力做参照。同时,湖南省宪法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的规定以及对人民民主权利的肯定,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她是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在湖南地区深入人心的反映,也是对北洋军阀专制权主义的否定。尽管这种“自治”的根本目的并非与湖南人民的利益一致,但也含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此时此刻的毛泽东也和他同一时代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样,胸怀祖国,心系人民,思考着如何改造中国社会,关注着地方自治的理论和实践。

早在1919年底的驱张运动中,毛泽东就开始思考“湖南建设问题”并提出了“建设新湖南”的主张。1919年12月,湖南的驱张运动开始进入高潮,毛泽东先后在《平民通讯》、《时事新报》、湖南《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了《湘人力争厂矿抵押呈总统府、

国务院、财农尚三部文》、《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等文章,提出了“湖南人民自决”的主张。

在他看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是愈闹愈糟”,其原因是“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已倒矣”<sup>[1]</sup>。他不仅相继在上海和长沙一些报刊发表了10余篇讨论湖南自治问题的文章,而且还亲自组织领导了请愿大游行,在整个湖南自治运动中,毛泽东始终站在队伍的前列,担当了一名急先锋和勇士的角色。1920年6月23日,他在《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中仿照美洲门罗主义提出了“湖南自决自治”<sup>[1]</sup>、“湘人自决主义者,门罗主义也”、“湖南省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仍抵抗之”<sup>[1]</sup>。此信于1920年6月28日分别在上海《申报》和《民国日报》发表。此文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时,正文前亦加有“复曾毅书”、“主张湖南门罗主义”的内容提要,毛泽东的实行“湖南门罗主义”思想就应时而生了。后于1920年9月5日,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彝发时评《“湖南门罗主义”》一文对其主张加以阐述。

1920年9月6日毛泽东在他的《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一文中援引了长沙《大公报》主笔龙彝所提解释门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

\* 收稿日期:2004- 02- 28

作者简介:戴开尧(1963- ),男,湖南武冈人,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

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sup>[1]</sup>也就是要使湖南“划境自保”，要争取湖南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改变“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的状况，“建立一个湖南人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

## 二 “湖南门罗主义”的思想渊源探寻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一个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勃兴的时代。纵观“湖南门罗主义”的提出和基本主张，我们不禁为青年毛泽东这种忧国忧民的爱国豪情和改造中国的鸿鹄之志而欢欣鼓舞，但究其根源，我们便会细问：是什么因子促成了青年毛泽东的这朵“湖南门罗主义”爱国主义思想“鲜花”适时“绽放”呢？这主要是由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中外地方自治思潮、严峻的国情、省情、民情及湖湘文化浸染下的湖南人刚劲强悍性格等多种因素合力作用促成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震荡

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为阻止“神圣同盟”和英国对拉丁美洲的侵略扩张，早期的一批政治活动家，如汉密尔顿、杰弗逊、克莱等人，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1878年，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表示要建立一种“伟大的美洲体系”，他写道：“这个体系具有大西洋彼岸的任何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力量，并且能够决定新旧大陆联系的条件。”<sup>[2]</sup>杰弗逊也是这种观点的积极支持者，他强调美洲各国“联合于一个美洲政治体系之内”的重要性，这个体系是“完全独立并与欧洲体系绝无关联的”<sup>[3]</sup>。对于“美洲体系”这个观点，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发挥得最完备了，他在国会发言说：“我们有力量建立这样一个体系：我们将成为这个体系的中心，而整个南美洲将和我们一起同在这个体系之内。”从这一点出发，克莱号召他的同事“要成为真正的美洲人，并且要率先倡导美洲体系”。他们这种要求民主、自由及建立“美洲体系”的思想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渗透到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

毛泽东在《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中提到“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美国著作是有充分的研究，并受汉密尔顿等政治活动家思想观点的影响颇深，同时对美国等国家实行联邦制存有好感，进而想把1918年他在湖南一师时建立“新村”设想作一次补偿和发展，同时他还将湖南与日本、瑞士等地作了一番比较：“三千万人，则等于明治改革时日本之人口也。地理较之瑞士而强也。多而无当，大而无当，无日本人瑞士人之知识能力与训练，空鼓其勇气，消极的

少意识的破坏则能之，瑞士光华之国，日本充实之邦，终未能见于大江流域之湖南也。”<sup>[4]</sup>因此，在这里，毛泽东看到了湖南地理、人口等自然条件与日本、瑞士、美国等国有相类似的特点，并比较出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从而在他所设计的“湖南共和国”，即所谓“新的湖南”、“理想的湖南”就是以瑞士、美国等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为榜样的。另外，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显示出来的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和消除国内歧见的力量，也为志在济世的毛泽东所仰慕。毛泽东发现当时的“国民精神是沉睡昏昧的，如此广袤落后的东方大国的新生和强盛绝非朝夕之功，他无可奈何地承认：“中国之大，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诸上建筑层楼，不等建成，便要倾倒了。”<sup>[5]</sup>他和他的老师杨昌济都认为中国的事情不能由总处下手，不能希望通过一次行动就全国上下一片红，只能由分处下手，从基层做起，于是，提出“湘人自治”、“湘人自决主义”等主张，这些都是以德国的政治模式作样板的，“德美都是先有邦，后才相互联合”<sup>[6]</sup>，德国之所以在拿破仑战争后通过民族精神的内在更新而于1871年完成耽搁已久的国家统一并迅速成为欧陆强国，主要原因之一是普鲁士邦的发展壮大，毛泽东就非常希望湖南成为东方的普鲁士，以勇武的精神拯救大衰颓的中国。

## (二) 中外地方自治思潮的交汇

西方近代地方自治思想传到中国，有一个历史过程。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一些地主阶级经世派、早期维新派即开始关注地方自治问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股地方自治思潮，地方自治思想传到中国后，就成了近代社会政治生活当中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资产阶级维新派、立宪派鼓吹它，为的是从地主阶级那里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力，以逐步改革社会，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纲领；资产阶级革命派赞赏它、鼓吹它，则是为了结束君主专制统治，实现民主政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民权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核心，而地方自治，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中占重要地位，是他关于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个重要设计，地方自治思想受到青年学子的青睐可以说是时代使然，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广大爱国青年(当然包括毛泽东)自然而然地把热爱祖国和热爱乡里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等先进的中国人，往往是以国家主人翁的自觉态度，来看待故乡在祖国振兴事业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意识到，中国是一个版图辽阔、人口众多的落后大国，如果没有各个地区人民的觉醒振作和齐心协力是很难求得整个中国的独立和富强的，因而在他们创办的刊物中，极力表示通过地方自治改善地方政治、经济，并通过地方自治合小群而大群，壮大新兴力量，成了一个重要的话题，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西方的地方自治思想和地

方自治制度,比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了。年青的毛泽东明显地受到舆论界这方面宣传的影响,我们可从《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等文章中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 (三) 严峻的国情、省情、民情的促使

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甚盛,全国上一片混乱。“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sup>[1]</sup>特别是湖南,成为南北军阀争夺的一个焦点。“南北武人,乃得乘隙陵侮,据湖南为地盘,刮民财归己囊。”<sup>[1]</sup>况且,毛泽东以为在历史上湖南一直“受中国之累”,得不到发展,而湖南又爱干涉别人的事,从而造成别人看不起,他说,“在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拥有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sup>[1]</sup>。并且湖南拥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先天地理优势。再加之在毛泽东看来,“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杂在全国总组织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sup>[1]</sup>。为了救民于水深火热,改变湖南屈辱历史,毛泽东在心底萌芽一种“救中国必从湖南始”,“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的强烈殉道气概。所以,毛泽东的“一省一省的人民各自去整理解决”,最终来个“总解决”的“湖南门罗主义”思想就是顺其自然的了。

### (四) 湖湘文化浸染下的刚劲强悍的湖南人性使然

不仅仅是因为湖南在南北战争中处于关键位置,更重要的是,厚重的湖湘文化养育了一批批民风强悍的湘人,这种坚毅果敢、不畏死难,敢为人先的性格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湖南人奋发图强改变中国。自梁启超、谭嗣同设“南学会”,在湖南率先进行现代启蒙运动之后,湖南就成为中国最先进的省会,“中国维新,湖南最早”<sup>[1]</sup>就是生动的写照。无怪乎宋教仁曾说:“湖南之民族,坚强忍耐富于敢死排外性质之民族也。”所以,在杨敏麟的《新湖南》发表17年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又一批热血青年,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发扬湖南人敢为天下先和创新精神,奋起组织驱张运动,并明确提出:要“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的,并摆脱一切外来反动势力干涉的世外桃源——“湖南共和国”的“湖南门罗主义”设想。毛泽东也盛赞“湖南人素有一点倔强性、反抗性和破坏性”<sup>[1]</sup>。这种与德国人性格颇为相似的“三性”性格

就是湖湘文化浸染下刚劲强悍的湘人性格的生动凸现。

### 三 “湖南门罗主义”思想的性质定位

通过以上对“湖南门罗主义”的提出、基本主张的阐述及其思想渊源的探寻,我们可以看出“湖南门罗主义”确是毛泽东仿照美国的“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门罗主义”的形式提出来的,它与1823年美国的《门罗宣言》在提法和内容的阐述形式上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而且两者都是以同一地域的共同性、政治原则和利益原则的共同性作为其基本的立足点,但是,美国的“门罗主义”的实质是想逐步实现“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独霸拉美的野心,这是一种霸权主义的活生生体现,而“湖南门罗主义”则是一种充分发挥湖南人民民主权利,利用湖南地域文化的优势建设自己家园,达到改造中国之目的近代的人民民主主义思潮。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一种既区别于封建专制主义、封建割据主义,又有别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民民主主义。毛泽东对此也指出“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而是指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愿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辞也不敢辞<sup>[1]</sup>。因此,这种方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既具合理性又具局限性的。

首先,“湖南门罗主义”是在军阀割据、军阀混战,全国动荡不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种实行湖南自治、建设“湖南共和国”,力图改造中国的政治改革方案和途径。其出发点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封建军阀割据,真正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实现祖国的独立与繁荣富强,这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军阀割据势力是一个沉重打击,这种历史进步性为当时的历史所昭明和凸显。

其次,“湖南门罗主义”的主张中体现了彻底的“主权在民”的原则和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思想。他坚决反对少数军阀、政客掌握国家大权,强烈地要求包括工人和农民在内的“有职业的人”掌握政权。他认为“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民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sup>[1]</sup>。他特别重视人民群众在实现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国”中的作用,主张依靠人民群众自下而上地改造国家,所以他寄希望于三千万湖南人民的“醒觉”。这里的人民的范围包括了农民、工人、商人、学生及其他人,这些人是管理国家改造社会的依靠力量,通过湖南自治运动和“湖南门罗主义”的实践,毛泽东树立了明确的群众观点,指出,从此以后,他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再次,“湖南门罗主义”思想中改造中国只能自

下而上、先分治后总治,由部分到全体的主张,包含着毛泽东已经开始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规律和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深邃思考和长远设想。毛泽东在军阀混战日益加剧,南方革命力量屡遭挫折的现实中敏锐地感到,立即谋中国的总解决是不可能的,“二十年内完全无望”,于是,在反复观察中国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变军阀混战为各省人民自治,认识到改造中国必定是一个自下而上、先分后总、由部分到全体的漫长过程。这个设想在当时来说是建立在以史为鉴,立足现状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性。虽因各种条件不成熟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但毛泽东始终保留了这个思路,在后来发展了其中的合理成份,提出了“星火燎原”、“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政权理论,独创性地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理论,以至今天推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是可以从“湖南门罗主义”思想中追根溯源的。

当然在充分肯定“湖南门罗主义”的合理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其显而易见的局限性。

首先,“湖南门罗主义”主张在对湖南历史和地理条件分析论证时不自觉地表现出极其浓厚的狭隘地域主义情结。青年毛泽东在阐发自己主张时以戊戌维新中谭嗣同和熊希龄被放逐,以及辛亥革命前黄兴出逃和马福益被杀为例来说明“湖南受中国之累”,又以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为例说明“湖南人爱干涉别人的事”。显然,作为通晓中国历史的青年毛泽东,用这些牵强的历史事实来论证“湖南门罗主义”思想,当然只

是为了宣传和唤起湖南人地域情感的需要,而不能说明他对所列举的历史事实的真实认识。然而,他这种主张完全抹杀了清政府镇压湖南人维新派和革命派以及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的阶级矛盾性质,而把它们说成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矛盾。这种错误的历史论证所唤起的狭隘地域主义情结是不容掩饰的。

其次,“湖南门罗主义”中所设想的“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有中央政府”的政治体制以及“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羡馀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需品”的经济结构更是一种政治浪漫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虽然他将湖南的地理人口等自然条件与瑞士等国作过类似比较,但却没有深入考察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特殊性质,注重得更多的是中国政治结构上的严重弊端,却忽略了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畸形和落后,这种企图在分散、落后和保守的小生产经济的枯树上生吞活剥地嫁接以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枝芽的行为显然与他以前所设想的新村主义一样,也是空想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产物,是一种改良主义,最终是行不通的。

####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 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
- [2] 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文集·联邦论[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4.
- [3] 杰弗逊.杰弗逊文集(第4卷)[M].北京:三联出版社,1830.

## Young Mao Tse-tung and “The Monroe Doctrine of Hunan”

DAI Kai-yao<sup>1</sup> & ZHU Jun-feng<sup>2</sup>

(1.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2.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Hunan autonomy movement, young Mao Tse-tung has imitated the American “the Monroe Doctrine of Hunan”. The main contents of this Monroeism is that “we do what we should do by ourselves by heart”, “we shouldn’t absolutely intervene in others”, and “we shouldn’t permit others to intervene in our matters”. This thought has synthesised by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the thoughts of Western Democracy and Polity,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autonomy movement, the critical situation of country, city and people and Hunan people’s characteristic under effect on flourish Huxiang Culture. This thought had strong effect on the doctrine of feudal tyranny and feudal discription. However, it had many historical limitations. In a word, “the Monroe Doctrine of Hunan” is a doctrine of Chinese people’s democracy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Hunan Autonomy Movement; the Monroe Doctrine of Hunan; young Mao Tse-tung

(责任编辑 胡乃武)